

# 新大同论

## ——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世界大同论

◇ 李庚香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其中,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坚持胸怀天下,是党根据百年奋斗实践首次概括提炼出的经验成果,具有深厚的理论支撑、扎实的历史依据和现实的实践需求,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博大胸怀、广阔视野和使命自觉,包含了树立世界眼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人类进步做贡献等丰富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坚持胸怀天下历史经验形成的理论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持胸怀天下历史经验形成的文化土壤。《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人类历史因此真正成为了世界历史”。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地球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美丽家园。对于中国前途命运同人类前途命运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一直有着深刻的认识。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摸索出的一条主动融入世界、与全人类共谋发展的有效经验,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与西方国家的零和博弈思维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是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共谋发展,这是党胸怀天下而不是霸占天下的逻辑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世界史观和国际主义精神,一直把为人类做出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社会观、宇宙观和天下观,是党坚持胸怀天下的文化土壤。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透彻地理解了整个世界的内在联系,树立了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并超越现存世界秩序的大同追求。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华文明崇尚和平、追求大同的基因,以及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睦邻友好、协和万邦的道义情怀和价值追求。新时代,我们要坚持胸怀天下,就是要坚持大同理想,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为实现世界大同做出实质性贡献。《决议》总结、强调和首次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本立场、根本方法与中华文明传统价值有机融合来思考人类命运、烛照世界大势、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危机、擘画和建设未来美好世界所形成的重要理论创新和思想成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世界大同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同论,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实现人类追求大同理想和美好未来的思想和行动指南。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世界大同论,需要深刻认识以下几个问题。

### 一、中华文明的大同想象与追求:从“小康”到“大同”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是地球之灵。人类历史已有约200万年,以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出现为标志的史前文明也有约1万年,可考的人类文明以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为代表,距今也有五六千年了。人类文明自出现以来就呈现出一种趋同的轨迹乃至规律,地域性文明逐步打破地理和文化区隔而形成更大范围的文明,直至形成今天全球化时代世界图景下的不同文明形态。从人类文明进化史来看,每种文明都有自主、自尊、自强的特性,都有以自己的文明形态为模本擘画世界大同的想象、冲动和行动。这种行动既有自然扩散、思想交流、文化和宗教传播、公平贸易、使节往来、自由迁徙等比较文明的方式,也有大规模的领土入侵、凶残的抢劫掠夺、有组织的宗教迫害、体制化的殖民奴役等野蛮的方式。令人沮丧和引以为戒的是,人类文明的进化进步既有崇高的道义追求与实现美好生活的思想创造和奋斗探索,也充斥着傲慢的唯我独尊思维、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谋划、血腥的杀戮征服、残酷的奴役掠夺等恶行。与带有残酷的殖民主义和掠夺扩张特质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具有蓬勃的创造力和坚韧的生命力,不断创造辉煌的历史,为全人类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虽经挫折而愈挫愈奋、历久弥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蕴含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共同理想,反映了人之为人的最为真挚、最为本质的美好情感。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就以深远的智慧、深厚的情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理想社会的图景进行了天才的想象,精辟地概括了具有终极理想意义的大同社会和具有现实感的治理良好的小康社会的本质特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今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以高度的文明自信、文明自觉立足小康社会的现实,不断追求大同社会理想的过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升级为全面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同寻常的历史性大跨越,而且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既深刻影响着中国,也深刻影响着世界。费孝通先生说:“我觉得人类的文化现在正处在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要形成一个统一体,而又尚未形成。……这个特点里边有一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我虽然是看不到这一天了,但是可以想象天下大同的景象,而且还想通过现在做的事情来影响这个鼓舞人心的前景。”费孝通先生所表达的是,世界大同是必然趋势,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是必然形态,同时也彰显出其对中华文明具有重要世界意义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充分自信。

在中华文明视角下,大同社会是中国人民亘古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它是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美丽中国、美好世界的最高形态。但现实的严峻和历史的经验都令古今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人民大众坚信只有坚实地走稳小康之路才能实现大同理想,并数千年一以贯之、不怠不息。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懈追求的现实社会理想,“康”意为“安”,“小康”即“小安”,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至汉代,“小康”从百姓的生活向往变成了儒家提出的社会蓝图,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国家对良好社会治

理目标的追求,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形态做出的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受生产力落后和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小康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即使是中国历史上一度出现的一些治世或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也只是相比于乱世而具有的国力相对强盛、经济相对繁荣、民生相对安定的情形。由于古代中国的社会演进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飞跃,始终走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兴盛时期的发展成果在乱世被消磨殆尽,小康社会也注定难以实现。

近代,康有为对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进行了集中探讨,但也未能形成科学的理论和可行的路径。康有为于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编撰《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历时18年完成。面对“空前未有之大变局”,康有为力图重建中国的知识谱系,为被西方列强分割的中国寻找、再造一个新的文化认同。同时,这也是要重建现代性的图景,重建现代化的认同。康有为将儒家的“公天下”思想与现代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并把它们与近代西方列强的军事暴力、金融垄断和资本体制剥离开来,力图去展望一个大同的世界。面对“亡国灭种”之大变局,康有为独具慧眼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所采取的利器不仅仅是武力,而且是“借武力而传教”“借武力而通商”。而“借武力而传教”对于中国社会的瓦解是根本性的,因为它瓦解的是风俗人心,是中国的文化认同。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不同,康有为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他看来,“变者,天道也”。不过,这种变不仅是事物之变,更是制度之变。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戊戌奏稿》,就是那个时代维新派推动变法的哲学基础。康有为的使命正是在于把儒学转换成一种“变法哲学”,把中国传统整理成一个可以运用于当时的思想文化体系。他在《上清帝第六书》中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因此,他指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从“一统垂裳之势”到“列国并立之势”,说明当时中国所处的世界环

境已经全非旧时景象了。他说:“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显然,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制度变革,其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运动,而是外部压力的催逼。在康有为看来,汉朝之所以为后世朝代所不及,乃在于“尊儒”。我们知道,经过汉初60多年的休养生息,新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汉代出现了“弱干强支”的政治不平衡局面。曾经长期遭冷落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最为关键的就是董仲舒的“改制”,即告别秦的法治和汉初黄老的无为而治,进行“拨乱反正”,“复三代之制”,回到西周的制度,实现大一统,这符合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的现实需要。但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周代的古制,而是“一统乎天子”。他的出发点就是基于当时诸侯王权力太大,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而尊天子和中央。董仲舒以原始儒学为假借,吸收了法家思想,通过运用“天人合一”理论,统合了自然与人文,为汉王朝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天人三册”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而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依据。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改革运动的思想领袖,他的改革逻辑就是从汉儒的改制思想中借来的。康有为改制、变法的目的也是“大一统”,但是康有为的“大一统”与汉儒不同。在当时的条件下,康有为“大一统”的实质,一是要“皇权归位”,也就是夺慈禧太后的实权归光绪皇帝,二是要让孔子这位“素王”成为“立法者”,实行“君主立宪”。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的“三统说”(黑统、白统、赤统)就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君主立宪”的合法性基础。康有为为树立改制变法的合理性,把孔子假托为改革者、改制者。而孔子作为理想和内在的价值就是“仁”,作为外在制度的设计就是“礼”。用康有为的解释就是作为理想和内在价值的就是“道”,而作为制度安排的就是“天下为公”,这四个字是康有为从《礼记》里发掘出来的一句话,这句话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格言。他说:“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康有为《礼运注》的精义在于,他把所谓的“三代

之制”由“三个朝代”描述为三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文明,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作为现实中的制度安排,它们又被统称为“小康”,而这是孔子所见过或者所知道的制度。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两千多年来,无论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统统属“小康之世”。在孔子后,中国之所以一直停留在“小康”阶段踟躇不前,是由于孔子之道被荀子的“武断”破坏了。但是,孔子的理想并不是“小康”,而是“大同”。尽管大同社会谁也没有见过,但它是一种推动现实制度变革永不停息的内在价值追求,它就是“道”“文明”本身。

康有为认为,孔子本人只是生活在由“升平世”向“据乱世”退化的历史时期。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借用文学家津津乐道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义,别开生面地说明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至于“太平世”,孔子也只是听说过而已。在康有为那里,为了实现大同理想,“小康社会”是不能跨越的基础,同时,大同理想又始终构成对于“小康”的现实制度设计的批判和超越力量。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蕴含着近代以来百年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历史逻辑。它不但使得“天下为公”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改革和革命的根本动力,而且指出,只有不断地改革和革命,才能避免“现实社会”——“小康”像孔子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败的穷途末路。理与物、道与器、经与权、大同与小康、事实与价值,这些构成了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实逻辑。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的核心,既包括“政治统一”,也包括“政治民主”。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赋予了“器”“物”“权”“小康社会”“事实”和“现实”以意义。这就是《大同书》之于今天的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其批判意义不仅针对中国现存制度和秩序存在的问题,还包括近代以来西方制度存在的历史局限。在康有为的思想中,显然有一种超越国家的世界大同的东方情怀,其不是像康德那样将“先验法则”作为世界的基础,而是从儒家的“仁”和“不忍人之心”出发,彰显了拯救人类苦难的博大胸襟,并由

此提出了一整套重建大同世界的人类改革方案。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建立在对于民族国家形式的欧洲现代体制的彻底否定之上的,这也是其与康德、黑格尔的根本不同之处——《大同书》中提出了“去国界合大同”“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的振聋发聩之论。同时,《大同书》还从批判私有制的角度出发,将对西方体制和中国传统体制的批判结合起来。在“去家界为天民”一篇中,康有为指出,家族制度乃私有制度之源,指出孔子理想的基础不是家族制度,而是“大同制度”,不是“家天下”,而是“公天下”,破除了“孔子思想的基础是家族制度”的定见。而且,从《大同书》的视野看,人类社会关系的根源也不是血缘、宗族和民族,而是“远近大小若一”的真平等。而《大同书》中“去产界公生产”一篇,则是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是“圣贤”和“天命”,“大道之行”所行的就是“天命”,而这种“天命”就是“民心”。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中华文明中,“大人”与“小人”之别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的。决定“大我”与“小我”、“大人”与“小人”的,是胸中“怀道”还是“非己”、“怀义”还是“怀利”。也就是说,与西方文明的“经济人”假设不同,与黑格尔的“个人”和“市民社会”不同,与康德的“理性人”不同,中国文化的人格动机设定是“公共服务动机”。这就是超越自私自利之心的成人之道、善政之道,是追求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对人民有利的人的内在动机,也是实现“小康”和“大同”理想的道义基础。与欧洲文明不同的是,在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中,“自我”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共同体”之中的,因为“己”的上面有家,家的上面有国,国之上则是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就是超越“小我”而达致“大我”的社会进化之道,也是摒弃自私自利之心的成人之道,而这些正是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和道德基础。

费孝通先生作为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对于人类文明的大同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世界精神具有深入的研究、系统的思考和深邃的洞见。他指出,“如今天下巨变,全世界都捆在一起了。文化上却是各美其美,不适应进一步发展下去的需要。

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都不一样。各大教派内部也不一样。斯拉夫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也不一样”,“但没有价值观的基本共识,就不能形成天下大同。共同价值观不是凭空来的,也需要经济基础”,“希望能选择一个共同繁荣、世界大同的方向”。他还指出:“全球性的经济系统已经出来了,全球性的伦理体系还没有出来。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怎么相处还是个问题,这将是21世纪的一个关键问题。我想,在这方面,诸子百家里边有大文章。他们用了一百多年来讨论这个问题。……在21世纪的新的世界中,中华民族要有发言权。……外国人以宗教为中心,我们是以伦理为中心,比他们高一步。所以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早熟。”“现在人类世界希望有一个天下大同的前景,需要我们这样一些研究文化的人出点力量,把各个文化中积聚起来的有利于人类和平共处的东西提炼出来。……不忘人类发展的大目标,懂得不同的文化怎么相处,而且善于把中国文化中的好东西发扬出来,补充到世界现代化的过程里边去。”“我们现在有条件,真正把祖宗的梦想实现出来,天下大同。”“多元一体是中国式的思想的表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人家和你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心地美人之美,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目的,为了经济利益。”“‘多元一体’的意思,是说我们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个中华民族,是在历史过程里边慢慢聚起来的。聚到一起,融合成了一个作为核心的民族,称‘汉族’。没有被吸收到这个核心里边去的,就称‘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和汉族形成了一个民族大家庭,都是中华民族成员,叫‘多元一体’。‘多元’就是很多个单元,‘一体’就是多个单元形成了一个整体。……现在不光是一个国家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整个世界也面临着‘多元’怎样走向‘一体’的重大问题。从国际社会讲,‘多元’早已经出来了,‘一体’却还没有形成。……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向讲求‘和而不同’,有好传统,有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经验。在当前这个世界局面下,应当对世界性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承担起我们的责任。”“价值观的冲突也许是人类过不去的一个关口。进入21世

纪,人类真正要碰到的大问题,可能是不懂得人和人怎么相处。”“在我国传统文化里边,有着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西方文化从重视自然世界的这一方向发生了技术革命,称霸了二百多年了。……自然世界要通过人文世界才能服务于人类,只看见自然世界而看不到人文世界是有危险的。这一点,人类在进入21世纪时一定会得到教训而醒悟过来。那时候,埋在东方土地里边的那个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也许会起到拯救人类的作用了。”对此,1990年,费老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足可以成为世界大同应遵循的文明准则。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发扬光大者和践行者,在大同社会理想引领下锲而不舍地建设小康社会成为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理论自觉和实践担当。在中国历史上,“小康”是基础和条件,“大同”才是目标和理想,但古代中国“小康”始终遥不可及。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把“小康”变成了现实。而在“小康”的基础上努力追求为世界谋“大同”,就具有新时代的特殊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构想,被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赋予“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从“实现温饱”到进入“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小康社会的思想不断发展,并且成功实现了中国人民数千年来丰衣足食的愿望,不仅完全超越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治世”和“盛世”,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奇迹般地实现了和平崛起,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破除了近代以来西方发展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实现天下大同理想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 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西文明世界地位的此消彼长

人类文明的起源如同群星闪烁,人类文明进化

和进步的结果如同星系布列,从相异的视角看莫不为异,从相同的视角看异中有同,并且总趋势是由众异而成大同。这种世界文明大同的趋向,一般都是由一种或几种强势文明主导和推动的。所谓大同不是全部相同、高度相同,而是最广泛意义、最大程度、最大范围的认同、趋同,本质是异质文明的相互包容与和谐共生。从理想意义来说,世界大同应该文明地、友善地、自然地实现,而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不仅世界大同前路漫漫、道阻且长,充满着不同文明、民族、国家及其同盟不可一世的雄心、征服掠夺的野心、永享胜果的痴心,而且不同文明的命运、民族和国家及其同盟的兴衰也起伏不定,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复杂性、风险性和挑战性。但自然和社会有规律,文明和历史有逻辑,兴衰成败有凭据,拥有5000余年辉煌灿烂历史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应该运用历史的智慧,深刻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同的发展趋势和实现途径,通过不断奋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为全人类谋进步。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种文明要长盛不衰,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发展大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预判大势、引领潮流、洞悉规律,必须循证历史、鉴于往事。追寻历史需要长时段,评判事件需要大视角,这就要求我们具有千年视角、格外重视500年前的“历史大分流”问题。李鸿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说过:“时至今日,地球诸国通行无阻,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千年尺度来对比分析,1000年前的公元11世纪是中华文明乃至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此消彼长的关键转折点。公元11世纪,中国正处在繁盛时期的北宋。北宋统治者延续了宋太祖赵匡胤开创的突出软实力和巧实力作用的国家治理方式,军事上采取将与兵分离,军政与财政、民政分离的制衡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唐末和五代时期军事将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分裂局面,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稳定。政治上倡导开明君主制,主张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提高官僚阶层的俸禄和政治地位,扩大和巩固了统治基础,同时实行官职分离,加强分权制衡,较为有效地防止了重臣专权,

保持了朝局和地方权力体系的稳定运行。经济上继承后周的均田制,减少和降低税赋,较少大规模征役,民生政策较为宽和,社会矛盾较其他朝代尖锐程度有所降低,同时引进高产水稻新品种,发展工商业,社会消费活跃,经济繁荣程度高,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或是中国其他朝代相比,都堪称富庶。文化上广兴教育,推崇科举,宋真宗赵恒亲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劝学诗》;儒学得到复兴,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思想融汇了道家和禅宗的思想,经程颐、程颢发展成理学思想,并种下了心学的种子,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学理化,并广泛推行,趋向于入脑入心,有利于增强朝廷、士大夫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社会认同,缓和社会矛盾。北宋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火药开始在军事上运用,矿业、冶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广泛应用,世界上最早的机械钟也在北宋发明出来,其他如造纸业、纺织业、制瓷业、制茶业等都达到空前繁荣程度。但是,北宋的繁盛也内隐着衰败颓废的因子,主要是为求皇权的稳定和国家的一时之安,北宋在军事、政治和思想教化等方面都采取了过于隐忍、妥协、保守的权宜之计,并由策略而转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朝廷到社会都不知不觉滋生了一种消极、苟安的意识 and 行为,中华文明曾经拥有的汉唐雄风日渐衰减。北宋虽称经济文化繁荣,但军事力量薄弱,被辽和西夏进逼,进而被后起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国所灭。北宋皇室南渡长江,在杭州重新建国,史称南宋,虽延续国祚150余年,但生存状况比北宋更加屈辱窘迫,而且最终亡于游牧民族蒙古的铁骑。北宋经济、社会、文化繁荣在于“和”,北宋存在的边患和生存的窘境乃至灭亡在于“弱”。这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文明兴衰的隐喻:文明既要具有美好、繁荣、和谐、富庶的内涵和魅力,还要有自我保护的力量和与时俱进的能量,否则,无论多么繁盛的文明都将会被野蛮逼迫、奴役甚至摧毁。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北宋的军政体制设计和统治方式深为愤激地指出:赵匡胤创立的各项制度,“专

力巩固中央政权,一切设施,都含着对内严防的性质。这是他和他的后代坚执不变的国策,因而宋朝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成为历史上怯弱可耻的一个朝代”。从千年的历史长视角来看,从北宋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800余年,其间元、明、清虽然都不失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大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也都有新的发展,但相对于历史趋势和在中西方实力对比方面,呈现出一条加速的下滑曲线,直至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奴役、掠夺、瓜分的对象。

而从千年视角看欧洲,从公元11世纪开始,基督教整合后的欧洲体现出较为统一的文明主体地位,强力统治的封建帝国的衰弱也促进了庄园经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逐步走出因蛮族入侵而造成文明退化的“黑暗时代”,“北欧第一次完全融入文明圈。俄罗斯大河流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遥远的北极圈都积极参与欧洲的军事、政治、商业和宗教生活。匈牙利最西端的草原也成为基督之地。欧洲大陆重心首次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转移到北欧肥沃平原上。在那一方土地上,新式农耕供养了骑士新军事阶层,也让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温饱无忧”。基督教王国的形成使抵抗和消除异教徒的威胁有了正当的理由和强有力的号召力,进而促发了从1096年至1291年的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这名义上是一种宗教行为,实际上逐步演变为一种军事侵略、武装掠夺和大规模的商业行为,道义狂热变成了一种追逐财富的强烈动机,长时期大规模的行动催生了公司化组织、新的商业模式和规则、银行金融业务,带动了制造业和远程贸易,孵化了欧洲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子。这期间,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界区发生了大量双向交流,当时东方的重要思想、发明、创造、技术等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欧,极大地增强了欧洲的技术力量和组织力量。而同时期,从西方传到东方的发明创造和思想却寥寥无几。另外,在此期间,蒙古族强势崛起,建立了强大的元朝,击垮了俄罗斯,摧毁了“达鲁伊斯兰”,却没有伤及基督教王国,因而那时的欧洲相对于东方,特别是近邻——伊斯兰世界,占据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欧洲以基督教和资本主义文明揭幕

的世界史,就是欧洲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自由扩张的具体历史,是在“理性”和“自由”话语粉饰下通过国家军事扩张和资本垄断对其他文明形态的野蛮摧残和毁灭。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在实现其世界大同追求的过程中,征服是其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掠夺和侵略是其文化心理本能,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是其惯用的幌子,不择手段地维护既得利益、霸权地位和强调自己国家优先是其极端自私的真实心态。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是以野蛮、残暴手段发展而来的文明,而且是一种企图继续以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高调和精妙的谎言包裹自私自利野蛮行径来塑造世界、统治世界的文明。

以千年视角审视中华文明在世界地位中的下滑曲线,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尊崇王道与实现富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中华文明尤其是作为思想主流的儒家文化尊崇道义,追求王道善政,强调以德治国、以德化人、以德服人、重义轻利、尊理抑欲,甚至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贬斥以力服人的霸道,贬低国家、社会和民间的积财创富行为,忽视和拙于国家财力、财政、财源的谋划、设计、开发,偏重于心性修养,轻视经世致用之学,谙熟于坐而论道、高谈阔论,荒疏于救世济民、富国强兵的实策实践,以致国计、国防、民生缺少制度性的平衡和保障机制,国家常常处于治乱兴亡的旋涡而不能自拔,文明成果不容易积累和向更高层次进化,使王道追求常常流于空谈和想象,并且导致主张富国强兵的思想与实践常常遭到顽固的阻碍。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难以成功,明朝张居正的治理变革之所以难以持续,就是因为他们以追求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变革实践从价值导向和思想根源上与宋明理学、陆王心学所诉诸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同思想和王道追求存在矛盾,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蕴的根本矛盾。儒家尊崇王道,却简单地、极端地与霸道对立,人为地抑制和抹杀利和力的客观作用,一方面提升了中华文明的道义高度,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中华文明自卫和扩展的力度,使美好的世界大同理想缺少现实的实现条件。中华文明之所以会在世界文明转型的门槛上徘徊了近9个世纪之久,诸多历史因素中固化的王道理想对于

国家富强的深刻制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欧美一些国家从17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天朝上国的盛世而自傲,闭目塞听,闭关锁国,拒绝与外国的进一步交往,在风潮涌动、危机四伏的世界格局剧变中自我陶醉、自我麻痹。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到了19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清朝的衰亡不仅是一个国家治理失败的单一事件,而且是一种文明发展代际差距的必然结果。费孝通先生曾谈到一个寓意很深的小故事:“太平天国的时候,曾国藩攻打南京,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胡林翼,胡林翼在采石矶那里看形势,看到一艘外国轮船从长江里开上来,逆流而上。他一看到这个场面,就昏了过去,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要变了。他这话很有意思,说明这个人看得很远。他看到了一个转折点,历史的转折点。一方面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一方面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工业力量。这个工业力量已经进来了。这是工业文明的力量,比太平天国的力量要大得多。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对手。从长江水面上的一艘外国小火轮,看到中国的一个新的局面要到来,这确实需要相当的远见。”历史证明,离开了富强之道,王道必然会流于空谈,国家就会陷入积贫积弱的境地。同样,只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富强而不遵循王道,国家就会走向霸权、霸凌之途,同样会失去人心。前者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后者则是西方文明中与生俱来的顽疾。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上,以人类文明的千年历史节点观照,有4000多年中华民族都处在历史的高位上。然而,用5000年中华文明史和西方500年大国崛起史相比较,中国的农耕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相比,缺乏的是“社会化大生产”这一现代化组织形态。世界历史是现代世界的产物。世界历史首先意味着先前局限于地域或民族的历史不再可能,意味着先前的偶然交往被普遍的社会交往所取

代。中国自近代以来,遭遇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和危机。与以往任何一种严峻局面完全不同的是,以1840年为标志性开端的挑战和危机,归根到底起源于现代性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及其内在的支配—从属关系。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历史之中,并且不可避免地被抛到由现代性所设置的关系之中。所谓现代性,是指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它包含两个基本方面: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而现代化则意味着进入现代性之中。用马克思的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是这样一种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使现代化进入现代性之中,成为一切民族之普遍的历史性命运。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如此,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也是如此!到了1840年,中华民族的命运曲线由历史的高位下滑到了历史的谷底。由此,民族蒙难,国家蒙辱,文明蒙尘。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代觉醒的中国人在器物、制度和思想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惊醒于民族危机。他们处于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民之思,向世界追求真理,为中国寻找出路,成为最自觉地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理论的局限和当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制约,这一切思想探索和变法实践都没有成功。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造成了势不可挡的世界革命大潮大势,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大潮大势中应运而生。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百年奋斗,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尤其是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迅速走过了西方几百年才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华文明追求“小康”与“大同”的理想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 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视角的中华文明觉醒和追求世界大同的新作为

追求世界大同的一个现实境遇和挑战,就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来看: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心,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东方转移,虽然仍然“西强东弱”,但出现了“东升西降”的趋势。二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西方大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美国先是频繁“毁约”“退群”,继而又“拉帮结伙”,进一步加剧了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大裂变,经济全球化势头有所减弱。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当前,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和宇宙科学等领域不断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这些都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并由此带动新一轮产业变革,创造出新产业、新业态,必将推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进一步塑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大变局孕育于其中、演进于其中。15世纪至16世纪,新航路开辟和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历史迈出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第一步。17世纪,欧洲主要势力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搭建起一个有限的国际格局,但其他地域还没有被纳入国际体系。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驶进了加速发展的轨道,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催生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既有格局。从19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其背后反映了世界大变局的演进发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两极格局瓦解,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但世界各种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多极化趋势愈加清晰。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遭遇曲折到奋起振兴,也

深刻影响了世界大变局的演进过程,引领世界不断朝着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

新时代,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趋势,呈现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特征、新表现。从根本上说,我们正在经历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向。首先,这个大变局是从事实上的“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的转变。其次,这个大变局是现代化发展路径从一元走向多元的转变。再次,这个大变局是从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向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勃勃生机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使得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巨大成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在这个大变局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大变局的根本动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是大变局发展的主要方向,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是大变局的重要内容,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度重塑是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大变局加速演变的重要推手,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是大变局的基本特征,和平与发展尽管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要推动力量,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格局“东升西降”趋势更加显著,推动世界大变局不断向纵深发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美国大规模骚乱等“西方之乱”不断上演,催生出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问题,凸显了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国际体系的巨大弊端,也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这一时期既是动荡变革期,又是战

略机遇期。如果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盛转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把握住全球大变局的脉搏,错失发展机遇而远远掉在时代潮流后面的话,如今中华民族早已赶上时代,中华民族迈向复兴的进程,紧紧与时代同行、与世界大变局紧密联动。

中国人民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近代以来,面对民族蒙辱、国家蒙难、文明蒙尘,为了寻求富强之道,中国人民尝试了各种办法仍然无法挽救日渐衰落的国运。面对愈救愈危的国运,面对清朝统治者和官僚阶层的思想昏聩和人格沦丧,看着他们不仅深谋远虑不复有,就连正常的统治意志也已经丧失,他们仅以个人的眼前利益为念,与他们谈变法不仅是对牛弹琴,而且是与虎谋皮。变法(或称改革、维新、改良)历来是一个政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非革命的方式自求生路的措施,是统治集团在面临政权覆灭的畏惧感、对国家存亡的责任感支配下采取的一种自我抑制与自我更新,是实实在在的利益的调整,必须以既得利益者让出一部分利益为条件,其本质是为了长远利益而对眼前利益进行割舍。它要求改革者与被改革者有洞察危险的远见,有对于现有政权的忠诚,有做出自我克制与自我牺牲的自觉与勇气,虽知可能失败而必做,根本而言,就是要显示一种精神的力量、人格的光荣,将胜败都置之度外。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考验是严峻的,通过则生,通不过则死。清朝统治者虽想以富强谋国,但不能放弃一家之私利而从世界之潮流,负隅苟延,终被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而唯有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而生,成就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业,其真谛在于马克思主义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精神的主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引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一举扭转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有两大思想来源,一是从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到曾国藩、胡林

翼、左宗棠、李鸿章,再到康有为、孙中山的理学、心学、大同思想,毛泽东是集大成者;二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条件下把“王道”与“富强”统一起来,找到了在王道基础上实现富强的新道路。

中华民族追求强大,更追求伟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小康”是现实,“大同”是理想。我们汲汲追求的始终是大同的“王道”,而非富国强兵的“霸道”,但不幸的是,“王道”与富强之道相脱节,最终成了坐而论道。在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交锋中,西方文明以“普世价值”为信条,却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包括坚船利炮、殖民掠夺等手段实现其信条。从黄帝开始,中华民族就重视修德振兵,主张文武之道的平衡。汉唐实现了文武平衡,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秦兴之于武,宋失之于文,其中蕴含了不少历史教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个都不能少、“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也是真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走“王道富强”的道路。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有求仁反不得仁的惨痛记忆,中国的“王道”、被西方的“霸道”打败。可是,西方的“霸道”违背人类的终极价值和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最终不会长久。在人类文明已高度发展且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今世界,若放弃“王道”、只求富强,反而不能实现真正的富强。费孝通先生深刻地指出:“现在表现得比较清楚的是强权。谁的力量强,谁就厉害,你们都要服从我。但是中国人知道,霸道是不行的。贾谊的《过秦论》,《古文观止》里面有,讲秦始皇为什么亡,他不是亡在别人那里,而是自己没有把一个秩序搞起来。……中国这么长的历史证明,霸道是不行的。霸道能压人,不能服人。人心不对,心不跟你。中国讲人心向背,意思是要从意识上边承认你。”唯一可行的是,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之上,克服“王道”与“霸道”相冲突的历史难题。未来百年,如果中国能够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就一定能够开辟一条以非西方文明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重复西方霸权主义的老路,因

为我们复兴的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文明。这一文明的核心就是“王道”,即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凌辱、掠夺达百年以上,但中国人民不是从中学到了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文明化”和“现代化”过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共同纳入我们的历史性筹划中。因为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依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制定方向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开辟道路的。这一进程不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开启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又一次开始在上流溢彩。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走着一条与西方现代化迥异的道路,这就大大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经历久远,走的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阶梯式发展和串联式演进道路,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才达到当前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并联式发展,快速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历程,14亿人口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进而整体迈入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这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无疑,“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处于不同语境之中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一个“落下来”的过程,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升起来”的过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就是要从“落下来”到“升起来”。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发展来说,无论是现代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开展的。如果不是现代性在特定阶段的力量开辟出世界历史,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依然会是地域性或民族性的历史,这一历史的基本活动既不会展现为现代化的进程,也不会展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那么,在经历了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之后,当今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对于当今的世界历史进程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就像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常可以看到世界历史格局的某种调整和改变一样,我们今天尤其能够观察到各种现象正提示着并且标志着一个巨大变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酝酿与历史性生成。如果说上一个百年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的,那么,以之作为参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变局将是尺度极大且意义极为深远的。特别重要的是,这一世界历史的变局又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具有非同寻常的、实质性的联系。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发展到了一个特定的转折点,正是通过这个转折点,开始对世界历史展现出新的重大意义。这个转折点就是“新的历史方位”,只有站到新的历史方位上,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历史性进程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开始显现出来的意义。由此可见,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抵达新的历史方位时,中国的历史性进程才会在对自身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对世界历史进程也具有重大意义,这意味着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承担起推动世界历史的任务。虽然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但深入人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和信心,各国相互依存、加强交流合作的动能依然强劲,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光明的前景。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变革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当前到2049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攻坚冲刺阶段,也是

民族复兴进程中“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是勇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真正具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科技创新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关键变量。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在百年变局中,我们要抓住机遇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尤其是要抓好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实现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同思想和路径擘画:从“天下观”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文明的进步是自觉的,人类文明的未来既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也取决于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擘画、选择和坚定追求。世界大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但走向大同的过程是漫长的、道路是曲折的、路径是不固定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文明不全是美好,还包含着邪恶,是在美好与邪恶的斗争、竞争中发展的。在文明的发展进步过程中潜藏着重重危机,需要人类时时刻刻认识危机、应对危机、化解危机,共同谋划和实现人类美好的未来。人类文明形态是丰富多彩的,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对人类尊严的证明,都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但是,人类文明的个性和差异性必然会产生分歧、对立、冲突、竞争甚至激烈的对抗和相互毁灭,个别文明形态总是企图以自身的文明主导、同化甚至取代其他形态的文明。自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资本主义为底色的基督教文明迅速超越曾经在世界文明史上各领风骚的以游牧与定居混合、农耕与传统商业杂糅、冷兵器武装的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已基本把世界瓜分完毕。进入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产生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强国为巩固或重新分配世界霸权,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先后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不仅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灾难,也让挑起大战的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沉重打击。当前,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余,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由于冷战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沉醉于人类历史终结的幻觉、执迷于文明冲突的认知偏误、习惯于例外和优先的心理优越感,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持极端排斥、遏制的态度,企图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优势、军事优势、同盟优势和话语权优势等继续维持其世界霸权和主宰地位,公然撕下曾经标榜的维护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正义、公平竞争、和平发展等人类美好价值的虚伪面纱,无所不用其极地运用新的冷战、经济制裁、政治渗透、技术封锁、军事干预、武力威慑等手段来阻止其他文明形态的发展和复兴,不惜以逆全球化的各种操作阻止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和破坏性,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有可能异化为阻碍甚至摧毁人类文明发展的能量。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塔米姆·安萨利指出:“人类已经拥有了摧毁地球的力量,似乎也正在往摧毁地球的方向发展。……当下的情势正是危如累卵,我想不出历史上哪个时刻跟现在一样,全人类被捆绑在失去制动的脱轨列车上,朝着悬崖飞驰而去。的确,今天的人们生活在彼此疏离的环境,各自待在自己的茧房之中,人类总是分歧不断,形成不了统一的计划。”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尽管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等方面日益联结在一起,全球化成为一种现实生活状态,世界大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物质条件,但是,500余年来一直主导近现代世界格局的资本主义文明限于其自身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内在狭隘性以及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永久垄断优势地位的自私性,日渐丧失其文明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对其他复兴的文明、新崛起的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处心积虑地予以遏制、打压甚至扼杀,人类文明进步面临新的历史危机,世界大同的发展进程遭受空前挫折,世界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这一空前严峻的挑战,既是人类文明进步面临的共同威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严峻挑战。人类文明进步需要新的主导力量,曾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历史贡献、已经从千年来下滑到谷底后实现触底跃升的中华文明展现出化解新的文明危机的重要价值和责无

旁贷的历史责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历经百余年的艰苦卓绝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稳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蒸蒸日上,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具有了以更加文明的形式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以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式推进世界大同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担当。在这里,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世所罕见的巨大历史变革,它必然会产生广泛、深刻和长远的世界影响。这个现代化是一个“三级跳”的过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化社会的跨越,体现出跨越式发展和发展阶段叠加的特性,既是经济转型,也是非常巨大的社会转型。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发展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在于其在完成自身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仅是成为一个如英、美、日、德、法等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强国,那么这一进程就不会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而只不过是作为某种表征从属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及其被规定的意义罢了。只有当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能够在消化现代性成果的进程中超越现代性本身时,它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才开始显现出来。中国所开创的新文明类型是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类型,它的现实前提是在特定的现代化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但它的成长绝不仅限于现代性中。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以扬弃现代性为本质特征的。否则的话,新的文明类型可能就不会积极地涌现出来并且持续地转变为现实性。对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说,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之所以是现实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这一实践进程在其展开过程中已然形成的目标取向。也就是说,它既是高度现代化的,又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取向的;它是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为其制定方向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其开辟道路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正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不确定性,但“丛

林法则”是走向毁灭的选项,人类应该有智慧创造共同发展的未来。坚持中国道路,就是要坚持以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发展方向,就是要稳步走向“民富国强”的道路,这既是对富国强兵理想的承续,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内在规定性的体现。坚持中国道路,就是指中国既要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的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要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汲取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不仅为中国人民幸福、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而且着眼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道义追求和富于创造性、建设性的世界大同思想,是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是当代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改善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是中华文明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举例来说,“新型大国关系”显然突破并超越了17世纪以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现代性的“丛林法则”,“文明互鉴”显然超越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以人民为中心”显然不同于“以资本为中心”,“共同富裕”的结果显然超越了“两极分化”的状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道义显然超越了“理性人”和“经济人”假设的鄙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定位显然超越了“个体优先”“个体本位”的价值定位。因此,如果说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仍然必须更广泛并且更深入地推动其现代化进程,那么,这一进程同时也将更多地呈现出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并且更经常地将这种可能性转为现实性。然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坚持胸怀天下出发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尽管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观”一脉相承,却不同于传统的“天下观”。因为在传统“天下观”的视界中,只有“天下”而没有“世界”。如何真正站在世界史的角

度,而不是仅仅站在地域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新时代,我们要为站起来而觉醒,也要为强起来而觉醒。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今天,带着深邃的历史视角和广阔的全球视野,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复兴不仅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赛道上的赶超,更是一个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兼收并蓄的气度;不仅是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更是一个文明观的自信表达。这一刻,古老的东方大国不仅以卓越的智慧启迪世界文明,更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拥抱世界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正是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阔胸襟,为各国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促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面对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代表着世界发展潮流,是对西方中心、主客二分、文明冲突、依附发展和赢者通吃等不文明、不合理思维与规则的批判和超越,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体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倡议。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共同体包括价值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三个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内涵,就是彼此相依、和谐共处。要扭转重西方轻东方的“西方中心”观念,实现从“西方中心”到全球视野的结构转向,我们既要重视同质性研究,也要重视异质性研究,在跨文化研究中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共同体建设需要共建共治共享,而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前提是坚持共识,所以,价值共同体建设是关键,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必须不懈追求、坚决维护。新时

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本质就是为世界谋大同,这就要求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精髓,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未来的全球共识,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步推进,紧紧把握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大同的正确方向。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和仁善亲和的特质,匡正了“历史终结论”的谬误,为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更富魅力和感召力的美好图景。2013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家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不断摸索出的社会进步方向,也是针对当今世界所潜藏和暴露出的新冷战思维、国际关系零和博弈困境、和平危机、信任危机、合作危机、全球化和发展困境等提出的正确化解之道。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进入了思想狂欢和势力扩张的迷途,它们没有利用世界和平出现的新机遇、人类文明进步充满的新期待消除文明隔阂,推动全球化更加公平合理地发展,造福全人类尤其是广大后发展国家,而是偏执地追求和强化自己的国家私利,无理地要求所谓绝对安全和本国优先,别有用心地推行以选举民主、个人自由、虚幻人权、市场经济等为标签的所谓“普世价值”,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并滥用经济制裁、科技封锁等手段破坏他国经济体系,已经蜕变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阻碍者,严重威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尽艰难形成的国际行为准则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格局。人类文明进步的曲折和苦难历程,以及现实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反复证明,西方文明具有唯利是图、恃强凌弱、残忍野蛮的特质,从既往的贩奴贸易、鸦片贸易、种族灭绝、殖民奴役到当今的“颜色革命”、北约东扩、非法入侵、经济制裁和科技封锁等,无不如此,其引领文明进步和新全球化的动能已经衰竭,其使命已自我终结,需要新的文明理念和思想体系担当使命、激发动能。“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也受到国际

社会推崇和称赞。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5000年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热爱和平、和而不同、仁者爱人、恻隐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崇王道摒弃霸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文明基因和真诚情怀,尊崇以德服人、以情感人,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符合终极的人性需求,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大同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里。……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

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倡议世界各国政党同我们一道,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廓清了文明冲突论的历史惯性思维迷雾,超越了道义论的贫乏性、狭隘性,引领了世界多元文明和谐共生的正确方向。近三十年来,关于世界文明的起源、发展历程、现实状态及其世界影响、未来趋势等的研究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话题。其中,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力。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造成伊斯兰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都正在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价值。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彼此文明的领导国家和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同非伊斯兰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明,应对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亨廷顿指出,在当今正在呈现的民族冲突和种族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首先,它是错误的,那种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将被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所侵蚀和取代

的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其次,它是不道德的,因为文化的传播基于权力扩张的推动,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所需要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悖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观。再次,它是危险的,因为它对世界是危险的,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西方也是危险的,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国的肩上。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做到: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把中欧的西方国家,即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因素。亨廷顿毫不掩饰他美国优先、美国利益特殊的立场,提出:“如果,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角色’的日益自我伸张继续下去,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但他也近乎坦承地指出了美国在对待文明态度上的错误,认为:“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

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就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文化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民族之间的文化不同,一定是要冲突的,不会团结的。他的这种思想,与我们是根本抵触的。费孝通指出:“西方对当前世界文化前途的分析很多就是从文化冲突入手的。我不必举例了。文化冲突在西方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西方国家强大了几个世纪,到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战争……如果我们回头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容易明白,中国已经不止一次把对立的思想体系或文化包容了进来而加以消化。亨廷顿在他的文化冲突论中,把不同的宗教认为终究是一种冲突的因素。但是看看中国的历史就可看到,中国文化怎样包容佛教和伊斯兰教,而能在当前的中华文化中和平相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讲的是零和博弈思维,即一种文明有所得,则另一种文明必有所失。而中国式的处世之道则是更多地寻求双赢式的“文明对话”,即竞争者即便在相互竞争时也能开展合作,这就像达尔文主义所说的彼此竞争的物种的共同进化。客观地分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学者观察世界问题的敏锐眼光,在世纪之交的特定时段内具有较强的阐释力甚至预见力,而且他还以学者的专业理性揭示了美国和西方推行“普世价值”的虚妄和必然失败的结局,最终也表达了世界不同文明多元共生的愿望。但是,“文明冲突论”也反映了亨廷顿作为代表西方价值尤其是美国国家利益学者的偏执立场,把文明的差异作为现代世界冲突的根源,



把冲突的现实性当作冲突的合理性,这不仅在道义上贫乏,缺少超越性、引领性的文明精神,而且掩盖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殖民恶行、霸权行径、冷战惯性。他对文明冲突的应对思路不是出于尊重不同文明的应有价值和平等和谐共生,加强交流和相互认同,而是把其他文明的发展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当作挑战,大力倡导美国和西方回归原初的资本主义价值,阻止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国内文明的多元化,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结盟,并不惜采取结盟、制裁、遏制等手段对其他文明进行打压,以维护西方文明的先发优势和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现在美国所采取的各项对外政策,如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性关系、不断加重对中国经济制裁的砝码和科技封锁,以及纠集欧盟和北约挤压俄罗斯的安全空间、企图以极端手段摧毁俄罗斯的经济金融能源安全体系等,都可以从亨廷顿的思想认识中找到或明或暗的答案。这也说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是立足于化解文明冲突,而是为文明冲突火上浇油。面对世界上众多且迥异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人类文明美好未来的高度和中华文化“和实生物”的角度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论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因文明差异而引发冲突的片面论断和资本主义立场的狭隘之见,占据了人类道义制高点,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永享和平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梦想。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

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植根于中国“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思想土壤,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破解文明冲突痼疾的良药,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选择,是人间正道。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明了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是化解全球治理危机的唯一正确选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低迷,发展鸿沟日益扩大,地区冲突频繁发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明显上升,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生物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调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人类文明进步与和谐共生面临空前严峻挑战,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已丧失活力和可持续性,原有的国际格局正在失去合理性和正义性,原有的自我固化、自我强化、自我神化的国际交往方式越来越不合时宜、事与愿违,任何想凌驾于世界之上的企图都只能导致自己国家更大程度的孤立、更快速度的衰落,每个国家的出路都在于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着世界大同的美好未来通力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家园,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提出了“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的共同向往,而且坚实地立足于当今世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国际格局和国家地位急剧变动、世界秩序深度调整的实际,针对各个类型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发展焦虑、安全焦虑、合作焦虑、冲突焦虑等提出了深谋远虑、切实可行、各得其所、合作共赢的方略,为实现世界大同愿景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视了矛盾,并确立了清晰、合理和可操作的原则与方略。当前,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一个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代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标杆,中美关系因富有重多的复杂含义而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美国为了强化和巩固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世界主导和霸权地位,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挑战,视中国的崛起为威胁,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包括现任总统拜登,一反中美建交以来的良好互动局面,不断地借助经贸、战略科技、台海问题、新疆问题挑起事端,对中美关系施压、探底,甚至有极端的倾向挑动中美脱钩,不仅严重影响了中美之间的合作和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干扰了世界范围的秩序安定和经济发展,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大同愿景的最大障碍。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为中美人民谋福祉和为人类谋进步的全局高度,深远谋划和牢牢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除障驱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而且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国际社会也期待中美关系能够不断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为此,中美之间要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多一些理解信任,少一些隔阂猜忌,防止三人成虎、疑邻盗斧,自己陷入自己挖掘的“修昔底德陷阱”;要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要妥善有效管控分歧,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努力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要广泛培植人民友谊,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对的事情,携手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的大同世界符合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利益,但需要各个国家、世界各个区域以及世界各类国际组织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协同,不能一厢情愿,也不可能靠单一的力量完成,

“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习近平总书记秉承中华文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情怀,急各国之所急、助国际组织之所需、行各国人民之所愿,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组织、不同的国际组织等国际平台上真诚地、深入地、生动地、设身处地地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受到各国政要、团体、民众和区域组织、国际组织的积极回应,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市场、资金、资源、信息、人才等等都是高度全球化的。只有世界发展,各国才能发展;只有各国发展,世界才能发展。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愿意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系,全方位加强和拓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绝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中国发展对世界各国是重要机遇。”同时,中国积极弘扬国际道义、勇担国际责任,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反击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方面率先垂范。比如,提出和笃行“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动力,尤其是有效地增进和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的切身利益,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得力举措。

第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明了中华文明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的重要历史机遇,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历史担当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既是具有坚定政治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坚定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文明型政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还是笃行中华文化天下为公、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情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都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舍我其谁的使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为世界做出更多更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为世界

谋大同的核心要义。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彻底扭转了千年以来在世界文明中地位滑落的命运,走向不可逆转的复兴新生之路,曾经的辉煌日渐重现,新的创造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的当代中国已经稳定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地保持在30%左右,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稳步提升,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条件。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平等协商开创共赢共享的未来,以开放创新开创发展繁荣的未来,以同舟共济开创健康安全的未来,以坚守正义开创互尊互鉴的未来。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共创未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只要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我们一定能够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向着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发。

新时代,文明悠远深厚、经济活力和韧性十足、社会万众一心、国家软硬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道义在手、时势在握,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美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创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从人类文明兴衰史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古代历史上的“华夏中心论”,还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都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只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才正确地回答了“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这一时代之问,从而切实地解决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同”与“小康”、“王道”(仁政)与“霸道”(富国强兵)、“天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正确地回答了在竞争性关系中如何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美美与共的问题。在人类文明史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构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也就是构建人类共同价值,也就意

味着中华文明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做到以下几条: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做贡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做贡献,坚定不移推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为世界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将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加强人文往来和民间友好,积极搭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前提和关键都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把经济发展好、把社会治理好、把人民的福祉保障好、把复杂的国际关系处理好。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对于世界而言就是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我们的伟大使命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不断深化、阐释、传播和践行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世界大同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大同世界。

作者简介:李庚香,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法学博士。

(摘自:《领导科学》2022年第7期)